

評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

王毓雯^{**}

摘 要

歷來研究指出，蒙元時代漠視、否定中國文化、儒教，中原文化始終得不到尊崇。本書以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英宗碩德八剌三代（1308-1322）為主，縝密、多元、系統地探究蒙元帝國的儒教保護政策，通過出版事業、文化政策等，研析蒙元時代試圖以傳統中國文化保護者之姿振興儒學、尊重中國文化，徹底改變了歷來將蒙古帝國視為傳統中國文化破壞者的形象。本論文詳介各章旨趣，以期本書於今後台灣蒙元時代研究史方面能有所裨益。

關鍵詞：蒙元時代、武宗、仁宗、英宗、出版文化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頁 1-732。

^{**}日本福岡大學言語教育研究中心講師。

一、

本書以元朝出版物、出版事業、以及儒教政策等多元角度來分析元朝文化政策。作者宮紀子為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中國語學中國文學專業，現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教。京都大學在學期間，受教於平田昌司教授，同時亦參與東洋史杉山正明教授的《元典章》課程，深受杉山正明教授之影響。這對她往後的研究上亦有深遠的影響。《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一書，獲得東方學會賞、日本中國學會賞。她的研究成果改變了歷來對元朝統治下的中國社會、文化政策的看法。接著，將就此書做一簡單介紹、評論。

歷來研究指出，蒙元時代，漠視中國文化，中原文化始終得不到尊崇，不少地位下降、失意的士人，由於仕途受阻，而藉創作民間通俗文學來抒洩鬱悶，如劇曲「西廂記」「琵琶記」等、白話文學「三國志通俗演義」等隨之興盛，產生了前所未見的嶄新文化。

本書《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的研究，徹底改變了歷來將蒙古帝國視為傳統中國文化破壞者的形象。特別以世祖忽必烈以降，統治中國、結合存在於東歐、伊斯蘭世界、中亞的兀魯思，君臨蒙古帝國的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英宗碩德八剌三代出版事業為主，探究其文化政策。本書已有高橋文治、櫻井智美、吳雅婷的書評，¹對本書內容皆有簡潔之介紹，就蒙古時代史的專業角度加以論述，並以研究史為基礎論析，為相關研究學者提供了重要參考。本書於學術史的定位、貢獻，以上三篇已做詳盡之論述。本文則詳細介紹本書內容，最後以中國文學史的角度做一評論。

茲將宮紀子的研究目的臚列如下（序章 14 頁）。

- （一）藉由探討分析蒙古時代的文化政策、出版活動以更進一步了解大元兀魯思之全貌。
- （二）提供正確的視點來分析同時代的文學，以端正歷來的文學觀。
- （三）蒙古帝國孕育出的文化對同時代的高麗、日本以及後來的明清、朝鮮、日本有何影響。
- （四）從蒙古時代的角度來闡析資料欠闕的遼、金、宋社會文化一隅。並探討蒙元文化延續至明朝所具有之連續性及其變化。

本書特別以口語漢語語彙所著之出版物、插圖等作品、儒教相關之書物、以及展現世界觀的地圖、地誌為研究對象，一一探討書物的編纂、刊行的過程，藉此考察蒙古朝廷的文化政策、各機關系統、科舉制度、文人動向等面向。

¹ 高橋文治：〈書評：宮紀子著《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東洋研究》第 65 卷第 3 號（2006），頁 99-108。
櫻井智美：〈書評：宮紀子著《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史林》第 90 卷第 3 號（2007），頁 116-124。
吳雅婷：〈蒙元的政治，文化的蒙元—評介宮紀子《蒙古時代之出版文化》〉，《台大歷史學報》第 45 期（2010），327-340。

作者作了繁複徹底的資料收集及相關考察，資料、範疇跨及大元兀魯思書誌、文學、制度、政治、文化等多樣文化類型，首先將本書各章概要臚列如下。

序章

第 I 部 蒙古時代的「漢語」資料與繪本的登場

第一章《孝經直解》的出版與其時代

- 1 引論
- 2 大元兀魯思一大紀念文化事業
- 3 《孝經》的流傳－有關黑城出土文書
- 4 有關《孝經直解》的插圖
- 5 大元兀魯思與全相本
- 6 與《孝經直解》相關之人士
- 7 結語

第二章 鄭鎮孫與《直說通略》

- 1 引論
- 2 《直說通略》的文體
- 3 監察御史鄭鎮孫與其週邊問題
- 4 《歷代史譜》與《歷代蒙求纂註》
- 5 蒙古時代之通史
- 6 《直說通略》的資料與編纂態度
- 7 《直說通略》與平話
- 8 結語

第三章 蒙古朝廷與《三國志》

- 1 引論
- 2 祠廟的建設與加封
- 3 《續後漢書》之出版
- 4 《蜀漢本末》之出版
- 5 《關王事蹟》之出版
- 6 結語

附 蒙古時代的說唱詞話－花關索與楊文廣

第四章 蒙古所留下的「翻譯」言語－舊本《老乞大》的發現

- 1 引論－直譯體與漢兒言語之研究史
- 2 金至大元兀魯思之口語漢語

- 3 直譯體之登場
- 4 高麗直譯體的接受
- 5 大明時代的翻譯體系——蒙古遺產 I
- 6 李朝之語學教育——蒙古遺產 II
- 7 舊本《老乞大》——代替結語

第 II 部大元兀魯思的文化政策與出版活動

第五章 有關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誥」的一些問題

- 1 引論
- 2 加號的經緯
- 3 立石經緯
- 4 詔書的日期
- 5 結語

第六章《廟學典禮》劄記

- 1 引論
- 2 關於編纂者
- 3 《廟學典禮》的插圖
- 4 結語

第七章 程復心《四書章圖》出版始末攷——江南文人之保舉

- 1 引論
- 2 儒學提舉司與肅政廉訪司
- 3 翰林院的審查
- 4 江南文人之保舉
- 5 趙孟頫之貢獻
- 6 程復心與其週邊問題
- 7 宮廷文人之對立—李孟之真實形相
- 8 出版與出版後

第八章 「對策」之對策——科舉與出版——

- 1 引論
- 2 「對策」之王道—培養江南文人之要因
- 3 現實之「對策」—模範答案之所得
- 4 對策之現實——《丹墀獨對》一書所見政書的流通與接受
- 5 結語

第Ⅲ部 地圖所見之蒙古時代

第九章 「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之歷程——一四世紀四明地方的「知」

1 引論

2 清濬與李澤民

3 四明文人之地理知識——超越時空

4 慶元——連結中國、朝鮮、日本的「知」之港口

5 「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之誕生與其後

終章

二、

宮紀子氏在序章以大元帝國朝廷畫家王振鵬「貨郎圖」為研究對象，注意到其畫中除書畫、卷物、文房四寶外，尚有《春秋》、《孟子》、《尚書》、《千字文》、《禮記》、《論語》、《毛詩》、《資治通鑑》等書籍參雜其中。畫中透露了當時中國貴族、富裕文人階層在日常便可接觸到這些書籍，而這亦反映出蒙元時期中國出版事業的興盛，以及大元兀魯思居於保護中國文化的存在地位。此外，書中論及元刊本的評價、國學、社學、書院、精舍等學校教育方面的充實，全真教的隆盛，還探討了第二代可汗以來所進行的儒教保護、學問獎勵等文化政策。總之，宮紀子氏闡明了蒙元朝歷代的可汗、各行政長官、蒙古貴族、畏兀、穆斯林等非漢族官僚積極參與策劃文化事業，並大力支持學校教育、參與出版事業、調度資金、收集或購買書籍、樹立紀念碑等文化事業。

接著就各章節內容作一介紹。

首先，第Ⅰ部「蒙古時代的「漢語」資料與繪本的登場」，以口語漢語語彙完成的出版書物和插圖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蒙古朝廷文化政策以及各機關係統、科舉制度、文人動向等問題，以深入了解蒙元統治下的中國實際狀況。

第一章《孝經直解》的出版與時代，探討大元兀魯思時代出身畏兀將門之散曲名家貫雲石所著《孝經》註釋書《孝經直解》的出版經過，藉以考察大元兀魯思治下的文化政策。

《孝經直解》一書，上圖下文，每頁版面的三分之一（上）為插圖，三分之二（下）為經文，為一全相本。作者指出，其文體不似平話、元曲所使用的白話，而類似於《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元典章》）等政書、元代白話碑所使用之蒙文直譯體白話風漢文，並論述了此書的出版實為紀念武宗海山誕辰而敕命出版的經緯，研析武宗海山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更積極於推行儒教文化。

成宗鐵穆爾去世後，大德 11 年 2 月經歷內訌，最後由兄長之長子即位可汗（即武宗海

山)，次子即位皇太子（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大德 11 年 6 月，武宗下令刊行蒙文簡譯《大學衍義》、《圖像孝經》、《列女傳圖像》。為紀念武宗誕辰，頒布「加封孔子制誥」，敕令將孔子稱號加上「大成」二字而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命各、路、府、州、縣之孔子廟建碑，八月皇太子即位時出版蒙文《孝經》以作為國家紀念事業，從此可看出大元兀魯思一連串的儒教保護政策。透過考察聖旨敕令的過程，加以探討成宗鐵穆爾至英宗碩德八剌時代文化政策，以期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孝經》使用了直譯體而非元曲、平話的白話體。貫雲石《孝經直解》的出版亦可視為紀念事業之一環。

貫雲石《孝經直解》中的插圖與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趙孟頫孝經圖卷》之構圖一致，作者指出，貫雲石可能是請託於母親親戚廉氏沙龍的趙孟頫為《孝經直解》繪製插圖。趙孟頫的插圖與本文有貫雲石畏兀文字蒙文註釋，可推斷此應是進呈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的作品。

自成宗鐵穆爾時代起，大元兀魯思治下，《孝經》深受朱子學、全真教、正一教的重視。對與仁宗關係密切的文化政治圈之儒學家、道學者來說，出版《孝經》為主要的文化事業，受到各方不同立場的支持。而仁宗即位後，實施了保護儒教政策以確立自身地位，貫雲石《孝經直解》應可推斷是在這般氛圍下出版的。

上圖下文插圖本中，除佛教相關書籍以外，貫雲石《孝經直解》應屬現存最早刊本。在大元兀魯思時代，為紀念可汗繼位、立皇太子而由國家主導出版全相本，此成為明代福建盛極一時上圖下文形式的插圖繪本的原型。歷來學者指出元朝不甚理解中國文化，為一黑暗時代。不過從這裡卻可窺探出大元兀魯思可汗、王親貴族、高官等積極參與提振、保護儒教文化的一面。

第二章考析鄭鎮孫《直說通略》，此書以白話文體記載三皇五帝至宋、金的主要歷史。作者藉此來探討大元兀魯思出版的背景及此書做為史料的價值。

鄭鎮孫《直說通略》一書，受到很高的評價，故至明代與大元兀魯思時期編纂的其他書物又重刻出版。然至清代以後，此書卻因以白話成書，被視為低俗讀物。不過，本書亦為紀念仁宗即位所出版的書物之一。鄭鎮孫任監察御史時受非漢族兩浙運使世傑之請託，以供經筵為目的，據《資治通鑑》《十八史略》彙整中國史編纂為《直說通略》。由此可知，在官方出版方面，擔負重責的是職掌提振儒學事業「勉勵校官、興學宣化」的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等監察機關。

大元兀魯思時代，八歲學齡前的孩童，做為基礎知識需背誦程若庸《性理學訓講義》、《蒙求》、《千字文》，恢復科舉制度時，朝廷又研定有關科考教育方針，徹底依據朱子學理念展開教育體制。這一時期除加封孔子、恢復科舉以外，在出版活動、教育體制方面已有完善的政策。此中，如通史、紀年圖譜、歷代歌三位一體，亦即可一覽中國史相關書籍的

編纂，蔚為潮流。蒙古帝國在橫跨歐亞大陸的 1300 年前後，伊斯蘭旭烈兀・兀魯思的《集史》、西藏年代記《紅史》等總述歷史之史書前後成書。鄭鎮孫《直說通略》也可說是在此潮流下應運而生的產物。

第三章論述蒙元王朝中任高官要職者參與《三國志平話》成書過程，而劉備、張飛、諸葛亮等人的加封、追封亦與成書有密切的關係。歷來，如《三國志平話》的全相平話被視為民間讀本或說書者種本而成書流傳。然著者則由可汗和朝廷文人的角度來研析，藉由考察郝經《續後漢書》、趙居信《蜀漢本末》、胡琦《關王事蹟》等相關資料的出版過程，探究造就出全相平話的蒙古時代文化、歷史背景。

世祖忽必烈以降，歷代可汗即位必下旨修繕保護各地名勝古蹟，官司除司祭祀外，亦兼負修繕廟宇之義務，當地耆宿、儒者及擁有中國史知識的達魯花赤協助廟宇的重建、修繕，可看出大元兀魯思積極保護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面。

郝經為忽必烈極為信任的漢人之一，其門下生郭貫，為集賢大學士禮部尚書，因郭貫的建議，朝廷於延祐 4 年（1317）下令出版郝經《續後漢書》。其出版經過如下：首先，自郝經家中取得《續後漢書》，經由禮部・中書省，後經翰林國史院的審查後，最後由中書省委託江西行省下的學校、書坊出版。

趙居信於至元 29 年（1292）與多名漢人受到御史大夫引薦任職於翰林院，受到歷代可汗的重用，碩德八剌時代，升任為文臣最高位階的翰林學士承旨。其著作《蜀漢本末》由建安山長黃君復刊行，從趙居信的經歷來看，其出版費用或由朝廷支付。

胡琦編纂的關羽資料集《關王事蹟》一書，受到當陽縣尹李夢卿的推薦，命玉泉寺刊行出版。大元兀魯思朝廷、怯薛的關羽信仰早在成吉思汗時期即已存在，在舊金朝下的山西軍閥武人子弟加入怯薛，成為蒙古成員的過程中，此一信仰亦逐漸擴散於蒙古貴族中。

郝經《續後漢書》、趙居信《蜀漢本末》、胡琦《關王事蹟》等書得以於延祐年間（1314~1319）陸續出版，實因此些漢人與仁宗關係深厚，受到仁宗的重用。而不可忽略的是，《全相三國志平話》的成書與流傳的背後亦隱含著大元兀魯思對三國志所顯現的興趣。

第四章以大元兀魯思朝廷的翻譯體制為基礎，探討華北地區「漢兒言語」與蒙文直譯體白話風漢文之關係，蒙文直譯體予以各地之影響。其證明了蒙文直譯體為蒙古特意創造出來的行政公文體，同時還研析了蒙文直譯體體系傳至高麗的狀況以及對明朝、朝鮮王朝翻譯機構和語言的影響，並指出《老乞大》語言是自蒙古語翻譯而來的。

世祖忽必烈以降，大元兀魯思命令文的頒布定型，由中書省、御史臺、樞密院總管案件、行省、行臺、宣尉司等，上奏可汗。此時，以畏兀文字蒙古語記載①上奏年月日、②輪值的怯薛為第幾日、③可汗或王族在何處、④隨侍在側之怯薛為誰、⑤上奏大臣的姓名。之後，再將上奏的內容與可汗、王族逐一口頭確認，將其記載下來，同時獲得承認、判斷

的案件中，將需要的文件製成「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裏、……聖旨俺的、□兒年（12支）、□月□日。□□（地名）有時分寫來」基本形式的命令文，蓋印後，頒布給負責機關、各團體、個人，再由各地方刻於石碑。

大元兀魯思朝廷的命令文、政書、國家出版書物採以蒙文直譯體來記載，此直譯體以蒙古語語法、句式機械式地直譯，故無法由漢語文法解讀。

有關學者指出，蒙文直譯體是起源於與自古存在於華北的非漢族鄂爾泰語系民族接觸後出現的「漢兒言語」。然而，遼・金下的契丹、女真等非漢族以及燕人的語言為漢語口語語彙，其中未能看出與蒙文直譯體之間的延續性。蒙古承續金朝的行政體系、文書、雅文聖旨等書式體例，但是金朝治下的典籍、石刻中卻未發現此一蒙文直譯體。如此看來，蒙文直譯體應是忽必烈以降，蒙文的命令文文體、用語、內容在逐漸定型之際，為保存蒙文原文的語感，而明定優先記載蒙文原文的語序、語法。於 1261 年前後朝廷對少林寺頒布的聖旨中，可看出當時已出現了滿漢合璧碑、以及《元典章》中所見之蒙文直譯體的一個轉變。

高麗王朝於至統元年（1260）臣屬於忽必烈政權，高麗王世子率官人子弟做為質子入侍大元兀魯思。至元 11 年（1274），忠烈王成為駙馬後，高麗王朝急速蒙古化。至元年間後，大元兀魯思與高麗王朝的公文皆為蒙文原文，再由高麗王府內直譯。

承繼大元兀魯思的明朝，初期時頒布之大明皇帝白話聖旨對漢地以漢語口語，對高麗、西藏、河西南部諸王家、汶萊的外交文書則使用蒙文直譯體。從這裡可以看出大元兀魯思的影響。洪武 15 年（1382）編纂了蒙文翻譯法的《華夷譯語》。此書的編纂是因為明朝外交語言和大元兀魯思時代同為蒙文與波斯語，故必須要學習蒙文的漢字發音表記。永樂 15 年（1407），翰林院設置四夷館，特資獎勵蒙文教育，但僅是模仿大元兀魯思時代蒙文直譯體以漢語語序逐一翻譯各國語言，最後終告失敗。

朝鮮王朝使用大元兀魯思時代編纂的書籍、《老乞大》、《朴通事》、《前後漢》做為漢語教科書，其後，還使用了大元兀魯思官方出版的政書、以及收錄直譯體聖旨、公牘《大元通制》、《至正條格》來做為吏文教科書。這是因為朝鮮王朝與明初朝鮮王朝外交以蒙古語為公用語，而必須學習蒙古語。此外，司譯院也將舊本《老乞大》做為正式的漢語教科書。《老乞大》描述高麗商人於大元大都經商的過程，現存最早的舊本《老乞大》發現於 1998 年，其語法和蒙文直譯體極為相似，該書是以蒙文《老乞大》為前提而成書的。除了在當時，明朝與朝鮮亦皆使用大元兀魯思時代特意創造出來的蒙文直譯體之行政公文，由此可知，大元兀魯思王朝滅亡後，蒙文外交文書仍繼續沿用。

第Ⅱ部「蒙元的文化政策與出版活動」，從出版的視點，來探討蒙古時代的儒學振興政策。

第五章以「加封孔子制誥」碑文為研究對象。此為武宗海山於大德 11 年（1307）「加封孔子制誥」，下旨敕令於稱號加上「大成」二字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透過此石碑的成立，考察武宗海山聖旨敕令的過程，從大元兀魯思儒教文化政策與出版活動的濫觴來探究「加封孔子制誥」石碑，同時探討蒙古時代儒教文化與相關機構組織。石碑與本書書題的蒙古時代之「出版」文化之內容看似相異，然對著者而言，石碑與出版在同具紀念、永續的特性上，可視為同一範疇，並無任何矛盾。

孔子加封的計劃，實始於成宗，是由統籌廟學、宗教、祭祀的集賢院所提議而實施的。然武宗海山即位時，特別選在大德 11 年（1307）7 月 19 日生日時，下旨加封孔子、頒布「加封孔子制誥」、立碑。故此可視為武宗海山政權保護儒教文化政策。

其後，閻復撰文「加封孔子詔」，頒布全國，至大元年（1308）3 月 23 日由集賢院上奏於孔林、上都、大都孔廟祭祀，同年 7 月 11 日派遣集賢院士祭祀孔子、顏子、孟子。

蒙古時代的碑刻質與量皆超越其他時代。其中「加封孔子制誥」石碑質量超群，則是因為至大 3 年武宗海山下令於各路、府、州、縣廟學立追封碑，提倡儒教保護的關係。而武宗海山施行忽必烈、成宗鐵穆爾未實施的事蹟、有意超越愛育黎拔力八達，拉攏儒者意圖擴大勢力的儒教保護政策，事實上也是武宗海山欲藉此於朝廷內擴張自身的勢力。

第六章考察紀錄元朝學校制度的《廟學典禮》的成書以及出版過程。本書使用了甚多類書的插圖以及儒教關聯的出版物。

《廟學典禮》並無元刊本，現存的書籍為集結《永樂大典》中引用資料的《四庫全書本》以及傳抄本數種。又現行的《廟學典禮》中載有太宗窩闊台 1237 年至大德 5 年（1301）的公牘，其高睿於大德 4 年（1300）前後參與成書的可能性很大。

《廟學典禮》為至大到皇慶年間於慶元路由胡貫夫所編纂成書。出版之際，曾歷任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江南行臺御史的高官參與成書的可能性極大。從《廟學典禮》中公牘的種類、禮制相關的書物出版經過、宣慰使以及各路總管關聯的內容來看，可推斷本書為官方出版物，而內容不同於現行刊物，以儒學關聯的公牘為主來編纂，而是以插圖來表現禮制。

如上所述，大元兀魯思的官方刊行物以插圖、記述來表現禮制的書物，爾後流傳至高麗、日本，也因此，相同的聖賢、先賢的形象、儒教文化超越國度、時代，成為中國、高麗、日本所共有之知識。大德 10 年於大都孔子廟落成後，此後各地的廟學建築、從祀的塑像、畫像、典禮儀式等皆從「圖制」急速畫一，這過程中，胡貫夫《廟學典禮》的完本可說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第七章以程復心的四書註釋書《四書章圖》為考察資料，詳細論述官方出版以及江南士人保舉的具體過程。本書首次出示了蒙古時代的官方出版制度，以及人物出仕的相關著

作，具體探討其過程中儒學提舉司與肅政廉訪司之間的密切關係、論述了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時代的大元兀魯思朝廷的派系、學派是如何反映在《四書章圖》出版、恢復科舉等政治情況上。本章在研析時，使用了程復心《四書章圖》申請出版時的呈文、咨文等上行、平行公文，此為具體顯現程復心的保舉與《四書章圖》出版過程的重要史料。

程復心的保舉與《四書章圖》審查出版過程如下：

- ① 杭州路儒者趙與虎等向杭州路儒學推薦程復心之著作



- ② 杭州路儒學研商後，將推薦書籍遞交江浙儒學提舉司，松江府知事邵某亦提交推薦程復心及其著作之請願書



- ③ 江浙儒學提舉司諮議《四書章圖》出版的價值，將書籍以及載有至此經緯之公文呈交江浙行省



- ④ 江浙行省再將公文、書籍呈交中書省



- ⑤ 中書省待宰相之指示，將相關公文、書籍呈交禮部

如上所述，杭州儒者、儒學於至大 3 年（1310）、4 年時保舉程復心。當時松江府知事亦提交推薦之請願書，這和當時杭州與松江文人的網絡有著密切關係。事實上，大德 11 年頒布的「加封孔子詔」做為施行儒教文化政策的紀念碑，於各路廟學立追封碑的主要人物吳舉，於松江擔任江浙道肅政廉訪司僉廉訪司，很有可能吳舉亦參與了此次保舉。儒學提舉司、肅政廉訪司分別隸屬於中書省、御史臺，此二機構在保舉地方文人、以及是否由官方出版著書的決策上具有重要地位。且江浙儒學提舉司、江南浙西肅政廉訪司皆設於杭州，可推斷程復心應是希望能迅速、有效率地通過審查，而於杭州申請《四書章圖》的官方出版。

其後，再經由以下步驟進行審查。

- ⑥ 禮部依照中書省的指示向翰林院提出審查申請



- ⑦ 翰林院向奉議大夫翰林待制薛友諒提出審查《四書章圖》之報告書，向禮部報告結果



- ⑧ 禮部參照浙江省咨文，向中書省提案命程復心為江南府教授

大元兀魯思之集賢院於保舉儒學教授之際，由禮部經由集賢院司直司委任國子監審查、考試，肩負重責，然而程復心的保舉之際，集賢院並未參與，故可推斷集賢院應為負責審查保舉時未預定出版的文章、小篇的工作。而翰林院則於官方出版的大部著述擔當待制、修撰、編修之審查工作。

最後，如下所述，完成敘任命令。

⑨ 中書省禮房將禮部的呈提交都堂，下令進行完成程復心任江南儒學教授的手續

↓

⑩ 向吏部傳達敘任之命令

大元兀魯思的保舉制度是由中央之訪賢以及各機關自發性薦舉，較忽必烈時代更重視保舉的用人制度，而這也確立了江南賢才任用的方法。而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時代恢復科舉制度，其政策必須要超越具有文教政策象徵的武宗「加封孔子詔」，也因此當時的文人亦乘機大力推行朱子理念之學校教育。

有關程復心的保舉與《四書章圖》的出版，集賢院侍講學士趙孟頫亦向翰林院提出推薦咨文。程復心《四書章圖》成書後，至杭州探尋出版方法時，造訪了大德年間擔任江浙儒學提舉趙孟頫，由此可推測趙孟頫已得知程復心及其著作的可能性極高。

程復心《四書章圖》一書，為使初學者容易了解，採以圖表式解說本的結構，是一本每頁有插圖、圖解的豪華版。其中有程鉅夫、王約、趙孟頫、劉珪等政要序文、詩作。為何此書有如此的序文、詩作呢？這是因為居仁宗側近掌有實權的李孟，對程復心敘任與出版施加壓力。政要的序文、詩作的目的則在於批判此一干涉，並證明《四書章圖》的學術價值。

程復心《四書章圖》或與大元兀魯思官方出版相同，由江南行省、儒學提舉司、御史臺的肅政廉訪司至宣慰司以及總管府、江南各路儒學的錢糧出版。爾後流傳至朝鮮、日本，對兩國的學術有很大的影響。

第八章仁宗恢復科舉制度，國子監等全國廟學、書院計劃的儒學教育，大元兀魯思的科舉，科目以「對策」為主，有關實施的內容、參試的所有書籍、由池州路建德縣學教諭程端禮為科舉考試學習法而編纂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等，詳細記載學習方法。

透過詳細多方研析出版當時菁英份子的實際狀況，探討科舉、紀念出版、官方出版等組織系統相關的問題，並考察以江西、四明為主的士大夫、菁英份子的生活模式、佛儒兼通時代的背景。

「Ⅲ 地圖所見之蒙古時代」，亦即第九章，本章資料龐大，以新發現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為研究資料，論述地圖成立的經過、狀況，並探討日本各地收藏等流傳問題。

本章中雖未對「現存最古的世界地圖」內容本身加以探討，但詳析地圖成立舞台的四明及朝鮮當時士大夫所處的知識世界。其中，指出了類書成立過程及其特徵，以及類書在使用上的難點。此外，從正面來描述藉由使者、僧侶所形成的中日間之交流，皆為歷來研究未曾研析的嶄新內容，予以研究學者很大的啟發。

此後，宮氏將本章加以整理，於 2007 年出版了《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東京，日本經濟出版社，2007）一書。

三、

以上就本書作一介紹。歷來研究大都認為元代社會存在著「蒙古至上主義」以及嚴密的階級制度，將人民劃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大族群。蒙元時代，漠視、否定中國文化、儒教，中原文化始終得不到尊崇，不少地位下降、失意的士人，由於仕途受阻，而藉創作民間通俗文學來抒洩鬱悶，其結果卻形成了通俗文化的盛行。

然而，現在的元朝史研究，有別於先前的「蒙古至上主義」以及嚴密的四大族群階級制度，如宮紀子著書中所示，對於蒙古帝國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變。

蒙古人、色目人積極參與中國文化的實際狀況，通過出版事業、文化政策，試圖以傳統中國文化保護者之姿振興儒學的元朝，這主要是歷史學領域的評價。然而元代通俗文學的成立，實有必要再重新理解其基幹部分。以研究文學的角度來看，此一研究成果的出現，或許也可讓我們重新思考元代白話文學、元曲等通俗文學產生的原動力，以及作品中所反映出元代文人形象。

宮紀子氏以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英宗碩德八剌三代為主，縝密、系統地探究蒙元帝國的儒教保護政策，如元代出現全相本之隆盛一般，蒙元帝國對後代的影響具有值得矚目的價值，受到極高之評價。

然而，武宗（1308-1311）、仁宗（1312-1320）、英宗（1321-1322）三位可汗在位其間共 14 年，之後的可汗：泰定帝（1324-1327）、天順帝（1328）、文宗（1328）、明宗（1329）、文宗（復位、1330-1332）、寧宗（1332）、以及最後的順帝（1333-1368），在位期間內訌不斷，且可汗亦時而更替。在如此的政治情況下，蒙元朝廷的文化政策是否能具有權威，為中國社會所接受，為一值得探討的課題。在探究蒙元朝文化政策、儒教保護之際，除了探究短期間在位的可汗外，如趙孟頫般，原為宋代王孫而出仕蒙元朝的朝廷內漢人與江浙地方漢人所形成的文人文化網絡實亦不容忽視。而此一文人文化網絡及其政治運動，在蒙元朝的政策決定過程中，以何種形式反映出來、又如何以可汗的詔令施行等相關具體的探討，亦期待今後相關的嶄新研究成果。

引用書目

一、 近人論著

吳雅婷：〈蒙元的政治，文化的蒙元—評介宮紀子《蒙古時代之出版文化》〉，《台大歷史學報》第45期（2010），327-340。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年。

高橋文治：〈書評：宮紀子著《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東洋研究》第65卷第3號（2006），頁99-108。

櫻井智美：〈書評：宮紀子著《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史林》第90卷第3號（2007），頁116-124。

Book Reviews: Noriko Miya, *Publishing Culture in the Mongol Yuan Period*

Yu-wen Wang^{*}

Abstract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Yuan dynasty ruled China has been treated as a time of darkness when the country'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ciety underwent a period of destructive change. By deploying a multifaceted analysis of a series of policies intended to protect Confucianism as well as publishing programs undertaken by the three successive Yuan dynasty emperors Wuzong, Renzong, and Yingzong, who ruled from 1308 to 1322, *Publishing Culture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 overturns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concerning the dynasty's rule of China with a compelling argument that the Yuan had high regard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treated its institutions with respect. Based on my belief that the book can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research into the Mongol period in Taiwan, I will endeavor in this paper to introduce the content of each of its chapters in detail.

Keywords: Yuan dynasty, Wuzong, Renzong, Yingzong, Publishing Culture

^{*} Lecturer,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Fukuoka University, Japan.